

成吉思汗

全传

朱耀廷 著
北京出版社



K827.46
2
成吉思汗

全传

朱耀廷 著
封面题字：刘天瑶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200号

制图：鹿春荣

成吉思汗全传

Cheng ji si han quan zhuan

朱耀廷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82 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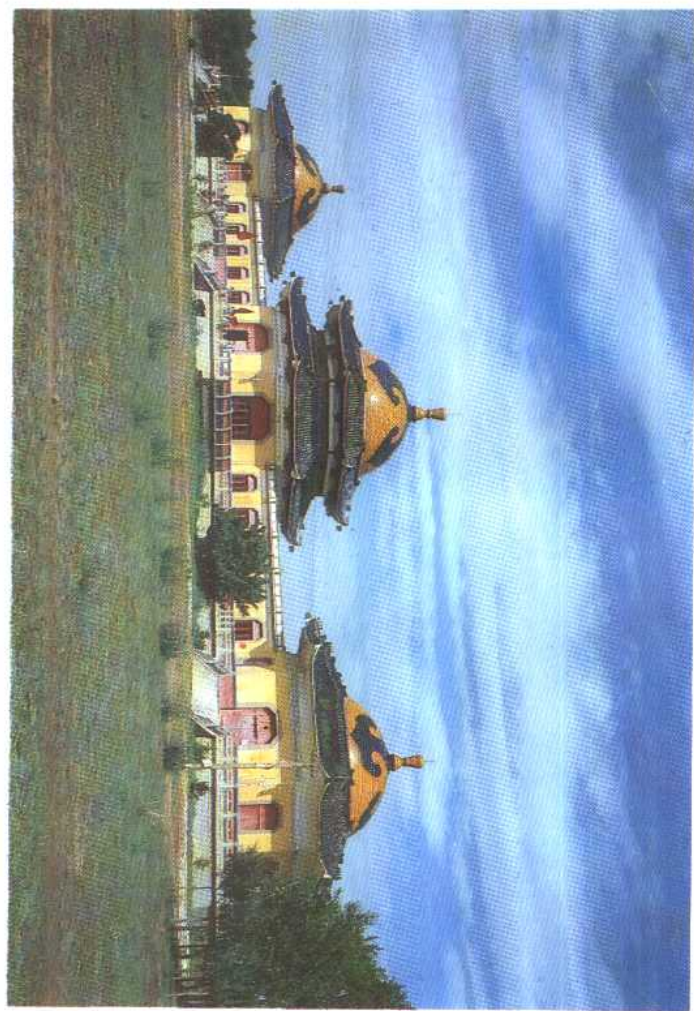
印数 1—10 000

ISBN7-200-01373-0/K·124

定价：8.80元



成吉思汗像



成吉思汗陵

序 言

——关系成吉思汗历史的几个问题

贾 敬 颜

朱耀廷同志编写的《成吉思汗全传》是一本比较通俗的历史人物传记。他参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原始材料，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用历史文学的形式描写了成吉思汗一生的主要业绩，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经验教训发人深省，是将历史与文学有机结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记、传说、故事、诗歌以至于评论，在世界各国的史坛和文坛上可谓多矣，多到几乎不易统计的地步。但中国人了解成吉思汗，开始只是借助于《蒙古秘史》、《元史》等书，后来才翻译了一些外文著作。解放后也曾有几位专家、学者写过几本学术性的小册子，可惜发行量不大，至今书店已很难见到。因此，写作一本全面介绍成吉思汗一生的人物传记，对于国内读者进一步了解成吉思汗这个伟大人物，还是大有裨益的。

朱耀廷同志将其书稿送我一阅，希望能写一个序言。我利用暑期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朱耀廷同志书稿的观点与我对成吉思汗的看法几乎不谋而合，于是乘此机会将我多年来对成吉思汗的看法整理成一篇文章：《关系成吉思汗历史的几个问题》，权当《成吉思汗全传》的一篇序言。我所讲的几个问题都是《成吉思汗全传》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成吉思汗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

问题，个别观点尽管与朱耀廷同志略有区别，但还不会产生张冠李戴之嫌。估计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我的序言艰深难懂，那也就只好敬请诸位海涵了。其实序言难懂也问题不大，因为《成吉思汗全传》本身还是比较通俗的，大家只要认真看完全书，我所谈的几个问题终归还是可以弄懂的。

一、首次即位之年

成吉思汗曾两次称汗，一次是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的可汗，一次是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即成吉思汗。第二次称汗是在1206年，对于这一点中外史学界都没有分歧。而关于第一次即位的确切时间，史学界却有不同看法。

甘肃酒泉西南文殊山（即嘉峪山）青衣寺有一块泰定三年（1326年）察合台后裔喃答失所立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其碑文说：

“……金转轮王皇帝南瞻部州，为世之主，传位于成吉思汗皇帝，即位之年，降生察合歹（台），义勇绝世，相貌端严，……”^①

“喃答失”，即《元史·宗室世系表》察合台世系表中的南答失。

在这里它明确提到成吉思汗即位之年便是察合台降生之年^②。

成吉思汗正妻所生共有四个儿子，其中惟有窝阔台的生卒年清楚。《元史·太宗纪》说：“在位十三年，寿五十六。”即是说，他死于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公元1241年，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即公元1186年^③。

① 碑文载《陇右金石录》卷5，第55—57页下。

② 最早利用这一碑文的是沈增植，见所著《元朝秘史补注》卷4页3下。

③ 蒙古文《黄金史》言：窝阔台汗羊年（即丁未，1187年）生，牛年（己丑，1229年）四十三岁即位，在位十三年，牛年（辛丑，1211年）五十五岁歿。只生年迟于《本纪》一岁。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第二子，窝阔台是老三，因此察合台必长于窝阔台一岁至数岁。以两岁计算，他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公元1184年；以三岁计算，他生于大定二十三年，即淳熙十年癸卯，公元1183年；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超过四至五岁，就是说，他生于大定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即淳熙八至九年，公元1181——1182年之间。

考证成吉思汗生卒年的人，向来持有两种说法，即寿六十六与寿七十二之别。我们主张前者，这也是中国史籍（包括蒙古文史籍）的传统说法。如果上面的推算不误，则那时成吉思汗正好二十二岁或二十三岁，再早也许二十一岁、二十岁。所谓“即位之年”，指的是他被火（忽）察儿、按摊（阿勒坛）等族人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合罕（可汗）”之年，就是说，成吉思汗做蒙古一个部落的首领的时间在公元1183年或1184年，再往前推，则不得超过1181年或1182年。这件事，理应发生在“十三翼”之战的前后①。

二、“察兀忽鲁”为何官

金章宗朝北征塔塔儿而成吉思汗与克烈部首领脱怜参加了战斗。战斗结束，成吉思汗被封为“察兀忽鲁”，脱怜被封为王。（从此脱怜便有“王可汗”之号，又写作“汪可汗”或“汪罕”。）②

“察兀忽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务呢？

“察兀忽鲁”又被写作jāūt——quri或“扎兀惕·忽里”。

① 《元朝秘史》将作“合罕”的事叙述在十三翼之战以后，参见120、130等节，据它书，当在此以前。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系此事于承安元年丙辰（1196年）。（见《观堂集林》卷14页28上至29上）但元人释念常作《佛祖历代通载》，其卷引于宋光宗绍熙二年而金章宗明昌二年辛亥（1191年）之下写道：“大朝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我们认为，所指必即是事。

“忽鲁”或quri、“忽里”是个突厥语词，义为统率数部之长。
《金史·百官志》叙录说：“统数部者曰忽鲁”，这种解释完全正确。与成吉思汗同时，汪古部的首领及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的将官都冠有这种称号。元好问《遗山文集》卷16《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谓碑主人完颜怀德之孙守英“官忽鲁”。
《金史》（卷102）《蒙古纲传》，称其人“本名胡里纲”。大概因为他是蒙古人，故以蒙古为姓；又因为他是“胡里”官，所以也叫做“胡里纲”。①“察兀”或jaut、“扎兀惕”不是别的，正是纥军或纥军的纥字或纥字的读音。“兀〔惕〕”、üt、“兀惕”不过为蒙古语名词的复数形式罢了。纥军或纥军，又被称作纥人、诸纥，等等。《秘史》称此种人为“主因—亦儿坚”，又说他们为“主亦”种的勇猛的军队。“主”也是纥字或纥字的读音，“因”——in与“亦”——j是蒙古语名词的所有格，“亦儿坚”——irqin或irqin，译作“人”、“民”、“百姓”，等等。故“主因—亦儿坚”可还为ju—inirqin（或irqin），而“主亦”可还原为ju-i②。

“察兀忽鲁”的含义既明③，那么，《太祖纪》所记，成吉思汗到净洲贡岁币而小看卫绍王允济（即永济），允济欲加杀害的一段故事的产生，便容易理解了。究其实际，这项记载系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女真南徙条》中抄来而稍稍改动其

① 其人，元好问撰《严实神道碑》（《遗山文集》卷26）作东平守将何立刚（但《元史·严实传》作和立刚），《元史·肖乃台传》作金安抚王立刚，同书《太祖纪》作金东平行省事忙古。但《金史》本传却说他是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1200年）进士出身，盖属于蒙古人之久隶女真人籍贯者。《金史·完颜伯嘉传》（卷100）有水城县主簿蒙古讹里刺，情况当与纲相类似。女真人姓氏中有光吉刺与蒙古（见《金史·百官志》），光吉刺是弘吉刺。弘吉刺与蒙古，都是当时的著名部落。

② 最先揭示这一奥秘者，乃王国维，见所著《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一文（见《观堂集林》卷16页3上至16下）。

③ 首倡此说者，为已故邵循正先生，见所撰《刺失德丁史集忽必烈汗纪译释》一文。（《清华学报》14卷第一期第79页）。我们不过加以推演而已。

文字，并明确地告诉人们：是金的纥军通风报信，成吉思汗才得以“迁延不进”，免于被害^①。

回到问题本身上来。蒙古跟金朝拉关系并不始于成吉思汗，而金朝与蒙古的和战关系几乎和自己的存亡相始终。成吉思汗接受“察兀忽鲁”一项职务表明，他不是什么突然崛起的“草原英雄”，自然更不是什么“外国人”了，他从年青时代起，便是纥军（或纥军）中的一员战将，是接受金朝封号的一个臣民。所以，按年按节要到指定的地方去向皇帝朝贺贡献。

三、“成吉思”名义考

成吉思汗取名之义何在呢？古人对此有两种说法：

（一）刺失德丁《史集·部族志》，谓成吉思之号乃帖卜·腾格里即巫人阔阔出所授。而刺失德丁进一步解释说：据蒙古语“成”（cin）意为“坚强”。[musta hkam]，“成吉思”乃其复数，与西辽君主之称古儿汗者相等，而“古儿”（Gur）的含义也是“坚强”。（见俄译新本1卷1册167页）

说蒙古语“成”谓“坚强”，无可旁证。海涅士据《蒙古秘史》203节 cinq setkilten kebtéul 即“忠诚的宿卫”一辞，解 cin 为“忠诚”，谓出于汉语的“诚”字；他进而又说：cin-ggis 即“成吉思”，来源于汉语的“正”字，也就是“对的”、“正统的”的意思（见《Worelerbuch》）。

（二）《蒙古源流》（即蒙古文《宝贝史纲》的更换名）、《蒙古世系谱》（即蒙古文《黄金史纲》的改写本）都说：鸡儿年铁木真二十八岁上于克鲁伦河即位的前三天，每天清晨有一五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木华黎事略》。引元明善撰《东平王世家》言：“金降者屡言，其主璟杀戮宗亲，荒淫殊甚。上曰：‘朕兴师有名矣’。”金降者便指那些纥军。璟，金章宗名。杀戮宗亲，谓爱王大辨之事。见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15页26上至38上）。

色鸟啼，声若“成吉思”、“成吉思”不止，叶其祥瑞，因以为号。初时，以为荒诞不经，后人附会之辞，无所依据。后来发现，它是蒙古的古老传说。检欧阳玄《金史附表》（载《圭斋集》卷13，又见《金史》卷端，但署名已改为阿鲁图）有这么一段话：“……念彼泰和以来之事迹，涉我圣代初兴之岁年。太祖受帝号于丙寅，先五载而朱凤应；……”丙寅即金章宗泰和六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是帖木真统一各部落、作全蒙古地区可汗的纪年。先五载正是泰和元年、南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也就是蒙古纪年的“鸡儿年”。这一年，帖木真会同克烈部的王可汗战败札木合等十一部的联军，这一胜利的以前或以后，还出现了“朱凤应”的吉兆。所谓“朱凤应”者，必指那个五色鸟鸣“成吉思”的故事，绝无可疑。

二说之中，后者源远流长，似乎更为可靠一些^①。

四、班尤尼河之战的参加者

班尤尼河之战是成吉思汗发展史上一次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战，也是蒙古历史上一次划时代性的战役。这次战役以少胜多，转败为安，打得十分艰苦，十分出色。据《元史·扎八儿火者传》所记，当时紧紧跟随成吉思汗的仅十九人，经过誓师的鼓励，最终击败了汪罕（汗）。

检阅一下有关传记，明白地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计十六人，扎八儿以外，有成吉思汗的二弟哈撒儿、妹夫孛徒、忙兀部首领畏答儿、兀鲁儿部首领术赤台、替成吉思汗招徕汪罕的塔海·拔都儿、能征贯战、戎马一生的速不台和他的父亲哈班、哥哥忽鲁浑、专门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十二探马赤军官之一的阿术鲁、后来担任太宗朝右丞相的镇海、被封为太傅等号的耶律阿海及其弟秃花，还有绍古儿、哈散纳以及麦里之祖雪

^① 朱耀廷同志的《成吉思汗全传》采用了另一种说法，可供史学家研究时参考。

里坚那颜。当然，我们不是说这十六个人必居十九随从者之数，只是说他们确确实实地参加了这次战斗而已。再重点地看一看其中有些人的历史，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次战争为什么成吉思汗取得了胜利，就连往后攻打金朝，又何以取得成功，都会容易理解的。

(一) 扎八儿火者，西域赛夷人，即中亚的Sairam地方人。曾经替成吉思汗出使金朝，也是了解金朝关防险要的侦查人。《金史·宣宗纪》上卷记载：至宁二年三月壬子、三月甲申、大元乙里只札八来。“乙里只”即谓使臣，“札八”即此“札八儿火者”。日后他导引成吉思汗入居庸关，下中都，立了大功。与丘处机有旧交，《长春真人西游记》尊之为宣差相公割八。但《蒙鞑备录》却以为“回鹘人”。

(二) 镇海，本传说他是“怯烈台氏”。但《备录》说他是回鹘，估计他是一位穆斯林化的克烈人。又说他“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乱同说鞑人治兵入寇。”《黑鞑事略》说他是回回人，“专理回回国事”，“主回回字，行于回回”。又是漠北屯田的倡导者和经营者，所以《西游记》等书又名之曰田镇海，或者称作阇利必镇海。

(三) 哈散纳，本传也说是“怯烈亦氏”，但其人长期以来却是阿儿浑军即回兵和回回工匠的领导人之一。因此，有理由怀疑他也是一个伊斯兰化了的克烈人。

(四) 耶律阿海及其弟秃花，两人传记都说是契丹人，世据桓州，是州尹撒儿儿之孙，尚书奏事官脱迭儿之子。阿海，作为金朝派往汪罕（汗）处的使人，并在那里结识了成吉思汗，且劝说成吉思汗反金；接着把秃花当质子，充任成吉思汗的宿卫。以后蒙古人侵略金境，他们又都当向导，被尊为太师、太傅。丘处机见成吉思汗，阿海任翻译，可见他还精通蒙古语。

由此不难见到，班尤尼战役以前和战役当中，围绕在成吉思汗四周而替他当参谋、出主意、跟他一道艰苦奋斗而出生入死的文臣武将中，早已有了一些来往蒙古地方以至远到中原诸区的回回富商大贾和十分了解金朝政治军事内情并已成为望族的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他们组成了成吉思汗的参谋本部和战斗核心。历史表明，成吉思汗的成功，绝非单靠那九十五名千户^①和从他们当中选拔出来的博尔术、木华黎东西方两大万户的力量和才干所能奏效的。必须从多方面，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另外，《圣武亲征录》和《石抹明安传》都记载了壬申年即金卫绍王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抚州獾儿嘴之战，金主将纥石烈九斤让石抹明安骂阵之事。此事，就是利用了明安“尝使北方，素识蒙古国主”这种老关系。而《备录》称明安子大葛相公（《黑鞑事略》作燕京大哥行者憨塔卜）^②“乃乱家人”。《亲征录》和刺失德丁《史集》又都记录了甲戌年即金宣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护卫金宣宗南迁而在良乡中途兵变的乱军三首领投降成吉思汗之事，其中的将领之一石抹孛迭儿之子扎刺儿，不但在木华黎指导下与耶律秃花等一道参加南征的行列，后来并且和史天泽、刘黑马构成汉地三万户，可谓替成吉思汗效尽了犬马之劳。联系上一问题，是否因为成吉思汗自己就是乱军的一个首领，所以才具备此种便利条件跟他们接触呢？耶律秃花、明安太保等，我们才怀疑他们是乱军。

《备录》说：成吉思汗曾在金朝当奴隶多年。此说不一定可靠。但是《备录》又说：金朝经常发动对蒙古的战争，所以，山

① 实则不足九十五之数，《秘史》多误二人为一人。《朮赤台传》言“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殆得其实数。

② 宋子贞撰《耶律楚材神道碑》谈到的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威得卜，便是此人。（参《元史·耶律楚材传》），《长春真人西游记》称燕京行尚书省金紫石抹公，

东、河北之人多买卖随军被俘而来的蒙古儿童作奴隶。它更说：“今鞑人大臣当时多有虏掠住于金国者”。后两者却绝非谣言。如果拿成吉思汗与镇海、耶律秃花弟兄同等看待，“奴隶”之说虽未必成立，然而成吉思汗及其文武大臣中的一些人早已在金朝作官，早已居住内地，早已来往中原之区做买卖，甚至被视同女真人、汉人^①的一部分，那是信然无疑的。

五、灭国四十与“四十万蒙古”

《太祖纪》赞语，称成吉思汗“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可见西夏不在被灭的四十国之数。但这句话乃出自金哀宗之口，修史的人不过借来歌颂成吉思汗罢了。

《金史·哀宗纪》下卷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纪事：“假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同签大睦亲府事^②，使宋借粮，入辞，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可见，不但不包括西夏，连金、宋乃至西域诸国也不计算在内。所谓“灭国四十”，只指的是大漠南北的部落与部族。

何以见得呢？

在蒙古人的习惯中，例以“都沁”（docin）即“四十

① 《秘史》281节译“札忽惕”一词为“金人每（们）”、《至元译语》汉儿曰“札忽歹”，《亲征录》说汪罕之弟札阿紺孛（即札合散不）“居汉塞之间”，与此相当的刺失德丁《史集》的有关部分，则作“契丹（此指中国，实谓金之境界）之jāugut地方”，可见乱军或乱人这时已被视同汉人了。参陈寅恪《元代汉人考》（《国史论丛》第2卷第1号116页）。

② 《元史·太宗纪》元年（1229年）八月：“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赠，却之，遂议伐金”。正谓其事，只是时期互异而已。

（万）”代表全体蒙古人众，而以“都沁·都尔本”（doēin dorben）即“四十四（万）”代表全体蒙古人众与全体卫喇特人众的总合。语言和行文中，“图们”（tumen）即“万”这个辞，往往被省略掉。

蒙古地方有四十万人众是个极古老的传承概念数字，契丹人、蒙古人无不如此认识。如：《韩禧墓志铭》（重熙六年）称其再从兄遂贞（即直心）官拜“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又如：新出土汉文、契丹文对照《北大王墓志铭》（重熙十年）颂扬墓主人万辛功绩，有句话说：“四十万之军戎咸归掌握。”再如：通贤《金台集》卷2《赠韩印书归会稽诗》形容和林胜概，有句话说：“带甲四十万，车庐日鳞鳞。”四如：《三云筹俎考》卷2记俺答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对天叫誓，谓“北虏夷人四十万”。《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卷，亦记俺答自言有“部曲四十万”。五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天命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开首便说：“蒙古国统四十万英主成吉思汗”如何如何。而次年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复信林丹汗，也写道：“阅来书，汝为四十万蒙古主”云云。

金哀宗的成吉思汗“灭国四十”的成说，实来于蒙古地方四十万军队的传统；就是说，大漠南北的部落部族，此时统归于他的支配之下了。

六、杀人问题

战争就要杀人，就要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恶性循环而死人；大量的杀人，大量的死人，都是战争所不可避免的。成吉思汗发动的对内、对外战争，不但不能逃脱这一规律，而且比其他统治者进行战争所引起的杀人、死人更为严重，更为残酷、更为可怕，因为他是落后者，是掠夺者，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被

人称作“世界征服者”的人。既然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一年走不到边的大国家，那么，杀人、死人的数目与程度，不问可知，自然是巨大的、惨重的了。

但是事情总有个变化，而且事物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起变化，杀人、死人问题也是如此。请看以下几项记载：

（一）《金史·胥鼎传》：元光元年（1222年）“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

（二）袁楠《清容居士集》卷28页482至483《宣宁郡侯刘公（伯杰）墓志铭》：“太祖皇帝沉几整武，蹙金逾南，乃肇定中原。物土萌孽，横生迭变，莫能称上意，将草芟而兽搜之，久而曰：‘噫！吾赤子也。’始料其民，俾执艺丕作，故家大姓，争占藉自谐，遂得脱锋镝，野处以居，飭材辨器，咸精其能，而人益效用，国以富强，猗欤盛哉！”

（三）《元史·郭宝玉传》：“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之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首项纪事，话出自一反对者之口，可信程度最大。这时正是木华黎受命统率五部探马赤军等十军南征的时候，木华黎虽然位在博尔术之下，但却是最受成吉思汗宠任、最能体会成吉思汗意图的人，翻检一下他和他儿子孛鲁，以及其他探马赤将官如肖乃台、阔阔不花等人的传记，果然都有关于不嗜杀、禁剽掠、释放“反复者”的记载，毕竟不能把它们都看成写碑传

人的阿谀之词。二、三两项文字(后一事,传文明确在1213年——1214年以前)都是关系成吉思汗本身和成吉思汗对别人建议的采纳与否,执行到什么地步,或深或浅,或缓或急,只是效果如何的问题。我们相信,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会有必要的秩序的维持,与制度、法令的建立。

七、西征中的两支“插曲”

说成吉思汗是一位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但说他在某些问题上比其他英明的帝王还高超,还敏捷,人们便会产生异议了。

《元史·太祖纪》赞扬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其奇勋伟绩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赵琪《蒙鞑备录》称颂成吉思汗“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历史上又有几个帝王能具备这几个方面的优点呢?所以,两者的赞扬与称颂,确也把成吉思汗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特点写下来了。别的不说,只举西征中发生的两件小事:

(一) 成吉思汗总军征西域,兵锋所到,势如破竹,一直比较顺利,只是1221年在蔑里可汗与其婿算端札兰丁的联军攻击之下,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对此,成吉思汗虽然极其伤心,但丝毫不露声色,也没有惩罚领兵的失吉忽都(秃)忽那颜,而是说道:“忽都忽向来习惯于打胜仗,从来没有经受过命运的残酷,现在,当他经受过它之后,他就会更小心一些,他将取得经验,他也将获得战况的必要的知识。”稍后,还亲自到达忽都忽等人和札兰丁交锋的地方观看了战场,“他发现他们的判断和算端的判断都不对头,于是说道:‘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地方适宜于作战’”①。

① 刺失德丁《史集》1952年俄文版卷1第2册222—223页。